

学习与参考

目 录

党政之声

- 习近平强调：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 (2)
- 习近平强调：保持战略定力 增强发展自信
坚持变中求新 变中求进 变中突破 (2)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干部的“12345” (3)

理论之光

-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胡德坤 (4)
- 共产党人要有“战士”风骨 辛士红 (7)
- 国家安全法的六大亮点 李 忠 (8)
- 谈市场和政府，不能忘了“人民” 潘 维 (9)

党的建设

- 从严治党必须强化问题导向 陈向阳 (10)
- 政德与政绩 何金定 (11)

时事热点

- 全面深化改革要力戒四种不良倾向 (13)
- 英雄人物岂能肆意抹杀 郑 直 (15)

名词解释

- “短期功利主义”、“权利傲慢病”等4条 (16)

习近平强调：

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要从

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习近平强调：

保持战略定力 增强发展自信

坚持变中求新 变中求进 变中突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

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做大做强做优国企

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

民生是“指南针”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要全面把握发展和民生相互牵动、互为条件的关系，通过持续发展强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通过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多有效需求。要特别关注和关心困难群众，坚持精准扶贫，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扶危济困。

增强改革落地能力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必须强调求真务实，增强改革落地能力，增强领导班子的原则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领导班子决策和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要紧扣关键领域做好改革谋划，蹄疾步稳往前走，不能在等待观望中错失改革良机、拖延改革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好干部的“12345”

新时期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好干部标准的问题。这些标准从灵魂、作风、品质、做人、做事五个方面对好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德才兼备，最终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即“一个信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

“2”即“两个字”：“严”和“实”。2014年3月9日下午，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3”即“三句话”：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4”即“四个人”：要心中有党，做政治的明白人；要心中有民，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心中有责，做发展的开路者；要心中有戒，做班子的带头人。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接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要求，广大县委书记要以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同志为榜样，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者、群众的贴心人和班子的带头人。

“5”即“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从日本战史资料看中共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胡德坤

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开辟的。敌后战场自开辟之日起，就被日本当局和侵华日军视为心腹大患，实施了欲置之于死地的灭绝政策。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不但有效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在战略上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透过战时日本档案资料和战史资料，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敌后战场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壮大（1937—1940年）

1937—1940年是敌后战场开辟、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为维护占领区的“治安”，发动了以敌后战场为目标的“治安战”，其重点是华北地区，百团大战后扩展到整个敌后战场。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先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末，华北、华东的大片领土和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共应进行以游击战为主体的持久战。按照游击战方针，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

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6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抗战，一开始便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1937年12月2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方面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就把对八路军进行“讨伐”列入作战计划。从1938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肃正作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旅团直属第三大队作战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忆，该旅团1938年4月在河北涞源、灵丘等地对八路军进行“肃正作战”，一年间进行了50次作战，“我军屡次讨伐，土匪被消灭了，但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步扩大。”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说，1938年秋，日军华北占领区“治安恶化”，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从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已成功地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入日军后方的一把利刃。

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

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里所谓的“治安地区”，主要是指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治安肃正要纲》，计划从1月至10月分3期进行。在制订计划时，日军还比较注意占领区内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存在，到第三期“肃正作战”中就完全将重点指向了八路军。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363号》命令中提出：“大本营的企图是希望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拥有24个师团、1个骑兵兵团，其中14个师团即56%的兵力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表明日本对华作战重点开始向敌后战场转移。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也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以治安第一为基调”“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由此表明，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也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1941—1943年)

1941—1943年，日本继续将敌后战场作为对华作战的重点，对敌后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紧紧依靠群众，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承担了中国抗战主战场的重任。

从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将“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强调“肃正的重点依然放在剿共上”，军事作战“主要是对共产党根据地歼灭战”。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的“总体战”，即以军事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手段，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对游击区进行“蚕食”。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写道：“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经过日军1941年的“扫荡”作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并未被摧垮。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作战，中共中央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后来归纳为“十大政策”，使各抗日根据地更能适应“治安战”的残酷环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将中国从南进的基地变成南进的“总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占领区“迅速恢复治安”。为此，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残酷。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指出，由于日本南进，中共会频繁发动反攻及破坏工作，“必须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更加主动作战，提高治安，谋求安定。”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反而使日军更加重视对抗日根据地的“治安战”。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1月份就高达1682次。与华北的“治安战”相呼应，日军在华中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作战。

1943年，日本继续将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指向敌后战场。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一次讲话中叫嚷，“要加以铁锤般的打击”“彻底剿灭华北治安之癌——中共军队”。4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有末精三少将在部长会议上提出，“中国问题的重点是粮食、物价和共产党三大问题”。

总之，从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在敌

后战场坚持持久抗战，使日本妄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泡影。

敌后战场的反攻与胜利（1944—1945年）

1944—1945年是中国敌后战场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时期，也是日本对中国敌后战场的“治安战”走向彻底失败的时期。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海上交通线被切断，难以保持本土与南方战线的联系。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计划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一号作战”，这就必然减少对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兵力，从而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机。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对经过日军3年“扫荡”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情况作了如下估计：“日军占领着中国东部的重要地区，重庆政府被压迫于黄河以南的内地及山岳地带，仅仅保住了残余势力。与此相反，中共军队乘日军转用减少之机，在华北、华中富庶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地盘，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首脑部在长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苦难的历程，其坚强意志和智谋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华北方面军预计，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中共敌后战场必定会进行反攻。

1944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各

抗日根据地确实开始了局部反攻，并尾追日军，在新的敌占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缩小了日本占领区。在“一号作战”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中将向大本营报告说，“原日本占领区的治安急剧恶化了。”此时，日军已无力对中共敌后根据地发动攻势，只能收缩战线，退守重要地区和铁路两侧地区。同时，中共军队已成为日本从中国攫取、运送物资的最大障碍。到1944年底，日本占领区缩小到“点”（城市）和“线”（重要交通线两侧），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显著扩展，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1944年，中共敌后战场通过局部反攻，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总人口从8000万上升到9000万，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7万人上升到65万人，成为1945年中国对日反攻作战的主战场。

进入1945年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继续败退。在中国战场，既要面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又要准备

应对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从1945年开始，敌后战场展开了以攻占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的春季和夏季两大攻势作战，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扩展。日军面对中共军队的反攻，步步后退，已不能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从而宣告了日本对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彻底失败。

日本对中共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失败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将日本拖入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脱身，导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走向失败。1939年前，是中共开辟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阶段。1940年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4至1945年，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则是中国战场反攻的主要力量。即是说，在8年全面抗战中有5年时间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战与反攻的主要战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选自《人民日报》）

共产党人要有“战士”风骨

辛 士 红

当下，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一些歪理邪说甚嚣尘上，一些不正之风“树倒根存”，一些贪腐分子不收手、不收敛。对这些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持什么态度、有怎样行动，是做爱惜羽毛的“绅士”还是当勇于斗争的“战士”，

考验共产党人的党性如何。应该说，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都会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不规矩的行为发生。比如，有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肆意诋毁英雄，歪曲党史军史，充当西方敌对势力的“马前卒”；有的把势头

当风头，把变通当神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有的无视政治规矩和政治规律，我行我素，欺上瞒下；有的玩弄踏雪无痕的伎俩，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问题并不可怕，勇于面对、切实解决就是了。真正严重的地方在于，有那么一些党员“明哲保身”，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该发声时不发声、该表态时不表态、该斗争时不斗争，当所谓的“开明绅士”。当“绅士”还是当“战士”，对党员来说是一道必选题，也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和平时期，尽管转换了战场，但“战士”本色不能丢。对

党员来说，在舆论斗争中，放弃话语权就等于放弃主阵地，不表达就会“被表达”；在正风肃纪中，放弃监督就等于纵容，选择沉默就等于包庇。不当“绅士”当“战士”，要求广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拒绝任何观望或是态度暧昧，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在各种不正之风面前敢于亮剑，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随波逐流、沆瀣一气。当我们像战士一样去捍卫正义时，正义就会如约而至；当我们像战士一样去驱散黑暗时，黑暗就会如风而去。在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阵地上，只要行动起来，你就是“战士”。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国家安全法的六大亮点

李忠

2015年7月1日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观念原则和制度机制。其创新亮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这是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贯穿国家安全法始终。二是突出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国家安全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安全工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表明，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安全观，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

民主本质。三是首次界定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法第二条首次对国家安全作出界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四是确立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确立了我国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此次国家安全立法的重要特色。五是首次提出网络空间主权这一概念。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

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六是首次规定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国家安全法中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有助于帮助全体公民认清国家安全形势、增强危

机忧患意识、树立国家安全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安全和相关法律，积极支持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履行职责，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摘自《人民日报》)

谈市场和政府，不能忘了“人民”

潘 维

首先，制度迷信要不得。而今不少人在讨论中国经济时，高谈阔论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好像两者间真有个抽象、绝对“正确”的界限。所谓“成熟的市场”和“成熟的法治”成了衡量现代社会的普世标准。这种制度决定论，与信仰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南辕北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由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而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制度塑造生产和生活方式。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成熟的制度，“普适”模式根本就是乌托邦。各国条件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干预市场的方式也就不同。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或生熟，关键在是否适合本国变动中的具体条件。其次，百姓的诉求随时代而变。在中国谈论市场和政府，不能忘了“人民”这第三方。市场要服务于人民，政府也要服务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老百姓要什么，民心在哪里，是党需要充分讨论的问题。百姓要什么随时代而变，但

“得民心者得天下”亘古不变。党因为实事求是，与人民在一起，才有了强大生命力。第三，社会主义不是空话。社会主义怎么变成了市场和政府有钱没钱的问题？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而非资本至上。社会主义是党与群众在一起，把人民组织起来。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以至诚感动了群众，把个人和群众组织起来变成了人民，挪走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群众没有组织就没有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搞建设同样需要把人民组织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科层体系能单独治国，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治，需要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原因有二。第一，没有任何政府有财力雇足够人手过问百姓间的“小事”，那必然会拖垮财政。第二，清官难断家务事，政府是分门别类依法治国办“大事”的机构。法律管“大事”，百姓的“小事”由百姓依照“习惯”管。我们领导经济，不能去追求乌托邦教条，而要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要与人民在一起艰苦朴素，要灵活机动地调整战略战术以满足我国人

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摘自《环球时报》)

从严治党必须强化问题导向

陈向阳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94年。对于一个执政已66年的政党来说，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调研时强调，党要管党丝毫不能松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属于能力不足的，就要加强培训，加强实践锻炼，加强总结提高；属于担当精神缺乏的，就要明确责任、加强督查；属于不作为的，就要严肃批评教育，认真执纪问责。这再次告诉我们，强化问题导向，是从从严治党的必然，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之必须。

强化问题导向才能实现党的自我革新。实现执政党的自我革新，历来是世界性难题。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由于不能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成功实现自我革新而倒台。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最具有自我革新精神的党。回顾94年的历程，我们党总是能够正视问题，推进整风整改，清除身上的污垢，治疗肌体的病症，主动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中央从作

风建设入手，出台“八项规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清理整顿“裸官”，规范领导干部违规兼职任职，整治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舞台上的奢华，压缩“三公”经费、狠刹公款送年货节礼风，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抓起，从容易出“四风”问题的节点时点抓起，到去年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5万多起，7万多人受处理，2万多人受处分……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从严治党，党风政风气象为之一新，正气为之大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郑重宣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伟大斗争的实质，就是要以敢于斗争的胆略和善于斗争的方略，解决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中面临的世所罕见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强化问题导向就是要有针对性措施。首先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审视自身，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高标准严要求。“源澄而流清，源浑而流浊”。强化问题导向，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着眼根本，注重从根子上对症下药，从源头上破解问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在执政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无数问题，问题无法规避、不可避免，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产生。习近平同志指

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保持和增强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才能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向问题发力，我们一定能在深化“四风”整治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赢得人民群众的肯定和信任。

从严治党不仅是一个理论课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强化问题导向的标准、强化问题导向的要求、强化问题导向的办法，管党治党再如何三令五申也会落空，正风肃纪再怎么反复强调也会走虚。

（摘自《支部生活》）

政德与政绩

何金定

政德是什么、政绩是什么，政德怎么修、政绩怎么谋，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三严三实”作出了鲜明回答，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旨在强化政德修养；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旨在强调干好政绩。“三严三实”揭示了政德政绩的深刻内涵，指明了政德政绩的实现路径和基本方法，体现了政德观与政绩观的统

一，是党员干部修炼政德、谋创政绩的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古人云：“政德贯乎心，藏乎志，形乎色，发乎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做官首先要立德，政德是从政为官之基。时下，一些党员干部不讲政德、不守政德的有之，不重政德、不尚政德的有之，不修政德、不履政德的有之。有的理想信念动摇、价值观扭

曲，有的宗旨意识缺乏、为民情怀淡薄，有的庸政怠政、为官不为，有的不愿艰苦奋斗、革命意志消退，有的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有的沉沦于声色犬马、沉迷于歌台舞榭、沉湎于灯红酒绿，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严重，有的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甚至有的心中无党无民、无法无天。大量事实表明，政德堤坝一旦失守，其它问题必然接踵而至。

物腐虫生，己正正人。政德贵在修、重在严。“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立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要坚持严以修身，正心明道、修行修为，做到信念如磐石、忠诚如泰山，达到“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的境界。要坚持严以用权，努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让权力这把“双刃剑”始终服务人民、为人民造福，不剑走偏锋。要坚持严以律己，心有纲纪、手握戒尺、行有尺度，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在修身律己、秉公用权中养成良好政德，实现以政德促德政、促善治。

党员干部必须谋政绩，良好政绩是立业之本。但是，谋求政绩，要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正确的政绩观。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患有政绩冲动，急于出政绩，盲目立工程、上项目；一些领导干部热衷政绩造势，事情还没有干，政绩通过舆论先造出来了；一些领导干部嗜好政绩造假，

虚列政绩，拔高政绩。政绩观一旦出轨，政绩必然出丑。背离正确的政绩观，必然会出现脱离实际、劳命伤财的败绩，损害生态、破坏环境的劣绩，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虚绩，夸夸其谈、欺上瞒下的假绩。有始无终的烂尾工程、哗众取宠的形象工程、花拳绣腿的面子工程、吹牛浮夸的泡沫工程、贪大求洋的贴金工程，就是生动的写照、真实的画像。

政绩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不是空想出来的、是创造出来的。实干是最美的政德，是金灿灿的政绩，一个实字、一个干字，道出了政绩的真谛。要坚持谋事要实，围绕实际谋划事业，聚焦问题思考工作，让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要坚持创业要实，树立脚踏实地的态度、拿出真抓实干的行动、保持钉钉子的定力，创造出解决矛盾的硬绩、推进工作的实绩、惠民利民的良绩，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坚持做人要实，对党赤胆忠诚，对人民一片忠心，对工作兢兢业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不实，蓝图再好也是画饼充饥；不干，梦想再美也是黄粱一梦。

政德与政绩表里一体、有机统一。政德正，就出硬政绩、好政绩，这样的政绩有口皆碑、交口称赞；政德不正，就出问题政绩、民怨政绩，这样的政绩被人拍砖、遭人唾骂。唯有政德支撑起来的政绩，才能泽被社会、惠及民生；唯有政绩映衬出来的

政德才能散射光辉、令人信服。党员干部要对照“三严三实”这一坐标，自省政德之失、自问政绩之缺。政声人去后，百姓论是非。做官有任期，事业无任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尚政德，履职尽责，埋头苦干，把为当前发展创造“显绩”与为长远发展创造“潜绩”结合起来，

把“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与“成功必须有我”的担当结合起来，做到履政一地、造福一方，为官一任、福泽后世，坚决防止一届风光、几届包袱，前任“得彩头”、后任“皱眉头”，确保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有更高的幸福指数，这才是政德之魂、政绩之要。

（摘自《党建》）

全面深化改革要力戒四种不良倾向

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进展顺利，但在有的地方和部门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尤其有四种不良倾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并采取得力措施尽快消除。

一种不良倾向是不敢负责任。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全面，怎样深化，改什么，怎么改，何时改，谁负责改，从中央的顶层设计，到各地各部门的目标书、路线图、时间表、责任人，基本上已经规划得明明白白。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有的领导干部对明明是自己的工作，有的部门和单位对明明是本部门单位的改革任务，仍要讨论了再讨论，研究了再研究，还要层层请示，逐级上报。这种态度，看似是讲组织观念，实则是不敢担责任，一遇困难、矛盾就上推。

另一种不良倾向则是不讲求质量。有的部门和单位，对于所承担的改革，表面上看，似乎是件件有交待，事事有安排，任务到了位，责任

到了人，似乎都是在按时间表和路线图推进。但细究其实，则是在敷衍塞责、应付差事，做的是“猫盖屎”的表面文章。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讲求表面光鲜，不讲求内在质量的所谓改革，败坏的是改革的声誉，伤害的是群众的改革积极性和“获得感”。

还有一种不良倾向是不讲求效率。有的部门和单位，衙门积习深重，机关病严重。对待改革，对待自身的工作，也在改、也在动，但就是拖拖拉拉、疲疲沓沓、蜗行牛步。明明是半天能办好的事，非要拖上一天。明明是一天就能办成的事，非要耗上几天。工作效率奇低，毫无时间观念和紧迫感。以这种工作作风对待全面深化改革，注定会迟滞改革进程，让改革的目标落空。

第四种不良倾向则是不善创新。有的单位和部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不想改，而是不学习，不会

改。嘴上讲创新，而思维模式上沉迷在墨守成规中打转转。对于所承担的改革，提不出新思路，拿不出新办法，最终还是以老眼光、老思路来对待创新改革，以老办法、老路子来解决老问题。这种旧瓶装旧酒式的改革，不仅难以实现改革目标，反倒有可能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疾，使老问题之上再叠新问题，老矛盾之上再擦新矛盾，与改革的目标追求背道而驰。

这四种不良的改革倾向需要戒除。必须敢字当头，以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以舍我其谁的大义担当，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奋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

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负责任。全面深化改革，列在“四个全面”之中，其推进的速度，完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其他三个全面的落实进展。因此，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肩负起改革责任，自觉承担起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重任。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承担各项具体改革事项的主要责任人，要在其位，谋其政，敬其事，担其责。对自己所承担的改革责任，绝不上推下卸，更不能凡事都要由上级逼着才干。不能当猪油灯盏，拨一下亮一下，不拨不亮，甚至拨了也不亮。而是不用扬鞭自奋蹄，从自身做起，以问题为导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

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讲求质量。质量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命线。我们所追求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有质量的改革，是提升人民群众福祉，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是切实解决问题，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五大文明全面进步，经得起时间、历史检验的改革。绝不能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就可以“萝卜快了不洗泥”，放松对改革的质量要求。绝不能以差不多、大概其的心态对待改革。对于那些仍然痴迷于“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热衷于注水政绩，搞“驴粪球、外面光”式的假改革、伪改革的领导干部，则要坚决问责，真正做到让“庸者下，能者上，贤者上”。

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讲求效率。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改革的时间表一旦排定，就得按既定的时间表，保质保量高效推进，就得以科学而有约束力的考核机制，确保改革效率。对于那些仍然遇事慢三拍，仍然一等二看三慢，仍然在浑浑噩噩混日子、舒舒服服做太平官，而又不能按既定时间完成改革任务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须有退出机制。

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所面对的改革领域和改革任务，都是久攻未克的顽垒，都是久治未愈的顽疾，都是最硬、最难啃的骨头。如果用老办法就可以解决这些老问题，这些问题早就解决了。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按部就班，是解决不了这些老问题的，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因此，对待全面深化改革，必须

要有创新思维，以新思路、新办法去解决老问题。

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全面深化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伟大事业。一切教条的、本本主义的方式方法，对于这一伟大的事业

而言，都是有害无益的，都是必须摒弃的。只有既不拘泥古人又不因袭今人，而是大胆创新，才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英雄人物岂能肆意抹杀

郑直

一段时间以来，远至花木兰，近到刘胡兰，从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到狼牙山五壮士、江姐、雷锋，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常常莫名“躺枪”，被假以“还原”、“重评”、“解密”、“起底”等名义恶搞，或被抹黑，或遭冷落，令这些长驻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受到无端摧残。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无不珍惜和善待本族本国的英雄人物。

翻开中国历史，从古至今的英雄人物，无不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宁折不弯的骨气、视死如归的豪气、舍身取义的正气，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最宝贵精神力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助时，给人以力量；迷惘时，给人以方向。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更需要建设一个精神强大的世界。作为社会价值坐标的英雄人物一旦被冷落、被肆意亵渎或涂黑，我们

就会失去前行的指针，失去明辨是非的标准。

戏谑、抹黑英雄人物的背后，既有搬弄是非的哗众取宠者，也有不明事理、人云亦云者；既有缺乏独立思考、胸无大志的幼稚心态，也有消费戏谑、精神缺“钙”的社会现象。

当一些人叫嚣着只有打破一切精神偶像才能找到自我时，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扪心自问：当价值底线与道德认同被摧毁之后，那个所谓的“自我”还能找到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在恶搞和抹黑中获得短暂刺激后，心灵变得愈加空虚，行为愈发失范；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精神追求开始迷失。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重温先贤的训示，我们真是要想一想，对那些经过历史评定的、民族达成共识的历史人物肆意抹黑，将会带来怎样的灾难？

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崛起

起，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上扬曲线，当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时，更需要昂扬的国家精神、优秀的民族文化来发挥“指南针”、“黏合剂”、“凝聚剂”、“推进器”的作用。

在日益自信稳健地走向世界时，中国不仅需要宽容多元，更需要在多

元中塑造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更需要珍惜和发掘在这方面的历史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凭空抹杀英雄人物的行为，如蛆虫附骨、蚁穴蚀堤，我们应大声棒喝。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名词解释

1、短期功利主义：指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日前，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撰文指出，知识不应该分“有用”和“无用”，对知识的有用性不能过于短视。当然，他说，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似乎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我们心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

2、权力傲慢病：指中国少数官员迷信权力万能，进而傲慢、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极易导致权力滥用，虽然手中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却动辄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漠视公民权益和民生疾苦。

3、公平焦虑：是公众在面对社会分配不均等现象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情绪，表现为对此类事件的强烈关

注与质疑。改革过程中的“公平焦虑”，既是对结果的焦虑，也是对过程的焦虑。在普遍的“公平焦虑”之下，不要说根本性的改革，就是试点改革也会如履薄冰，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

4、城会玩：“你们城里人真会玩”的缩写。原本意思是讽刺某些人做的事情常人无法理解。后来就变成了朋友之间互相调侃的一句话。专家分析称，“城会玩”被热传，从传播机制上来分析，网友把自己定位一种看客身份，用各自的眼光去看待网上传播的各种新奇现象，符合网民的围观心态。从社会学去解构，这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导致的一种价值认同差异，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让网友用这种近乎戏谑的方式来吐露内心不快和压抑。